

营农济牧：论西晋典农都尉的隶属、职能及相关问题

姚 乐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04)

【摘要】魏末晋初朝廷已罢屯田官,而西晋太仆的官属中却依然可见名为典农都尉的农官。通过梳理比对史料,辨析今人围绕该问题提出的三种假说,可确立其中一说,并得出若干新知及推论。第一,西晋太仆下领典农都尉并非史籍误载,而是确实存在的制度,且该制度在曹魏末年就已设计或形成。第二,太仆下设农官并非魏晋特有之制,牧政部门经营农业的现象更是在多个朝代都曾出现过。第三,牧政部门营农的深层原因是官营畜牧业在饲料方面依赖种植业,其现实背景则是国家征自民间的粮草无法充分满足官营畜牧业的需求。第四,曹魏时期,官营畜牧业的饲料可依靠屯田民的生产来补充,魏末改民屯为郡县的同时,统治者在太仆之下设置典农都尉,其目的应是保障官畜特别是战马的饲料供应不受影响。第五,西晋史料中有一类名为“田驹”的人群,他们应该就是太仆系统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吏卒,是典农都尉管理下的农作主体。

【关键词】西晋;典农都尉;太仆;田驹;农牧关系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5)01-0079-09

Supporting Pastoralism with Agriculture: On the Subordination, Functions, and Related Issues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s Dian-nong Duwei

YAO Le

(Institute of History,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04)

Abstract: After the abolition of state farm officials, there was still an agricultural official named Dian-nong Duwei among the subordinate officials of Taipu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That was not an error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but a system that really existed and had been designed or formed at the end of the Wei Dynasty. The inclusion of agricultural official among the subordinate officials of Taipu was not an institutional phenomenon unique to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pastoral administration running agriculture had even occurred in several dynasties. The deep reason for the pastoral administration to run agriculture is that government-run animal husbandry depends on the fodder provided by agriculture, and the immediate reason is that the grain and grass collected from farmers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government-run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Wei Dynasty, the fodder for government-run animal husbandry could be supplemented by state farms. At the same time that most state farms were converted into counties at the end of the Wei Dynasty, the imperial court added Diannong Duwei into Taipu's official subordinates, the purpose of which should be to ensure the supply of fodder for state-owned livestock, especially warhorses. In the historical data of Western Jin Dynasty, there was a group of people called Tianzou, who were probably the farming personnel in the pastor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ain force of farming under the

[收稿日期] 2024-02-04

[作者简介] 姚乐(1985-),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历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历史地理。

management of Diannong Duwei.

Key words: Western Jin Dynasty; Diannong Duwei; Taipu; Tianzou;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典农都尉等屯田官的设置,作为汉末三国农业制度研究的核心议题,历来为中外学界所重视,相关史料有限而学者讨论又多,几乎已是题无剩义^①。然而,魏末晋初罢屯田官之后,有关西晋制度的史料中却仍可见典农都尉一职,且它隶属于并不职掌农政的太仆,这曾引起官制研究者的困惑。西晋太仆下领典农都尉,是否文献误书?若文献无误,则该典农都尉的职能是什么?本文谨从制度史、农牧关系和时代背景等角度着眼,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问题的提出

《晋书·职官志》中关于诸卿之一的太仆,有如下记载:

太仆,统典农、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车府典牧,乘黄廐、骅骝廐、龙马廐等令。典牧又别置羊牧丞。太仆,自元帝渡江之后或省或置。太仆省,故骅骝为门下之职。^②

上引史料中,自“典农、典虞都尉”到“羊牧丞”,所记都是“元帝渡江”前亦即西晋时期太仆所统的主要官属。秦汉太仆皆“掌舆马”,除掌管“主供天子私用”的车辇和御马外,亦管理“大祀戎事军国所须”的马匹^③。西晋太仆亦然,所统典牧都尉和车府^④、典牧、诸廐令,皆与其“掌舆马”的核心职能直接相关。牧官不仅牧马,亦牧牛羊等其他牲畜,故典牧令之下又有羊牧丞。典虞都尉主管田猎之事,有车马及牛,隶属太仆也容易理解。

然而,典农都尉也出现在太仆官属之中,这不免令人感到困惑,主要疑点有二。

其一,典农都尉本是屯田官,而魏晋易代之际已有过罢屯田官的举措。东汉末年曹操建立的屯田官系统中,典农都尉隶属于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续汉书·百官志》大司农条刘昭注引《魏志》云:“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⑤就秩级而言,典农中郎将、校尉与郡太守相当,典农都尉与县令、长平齐,故后来改制时,典农官就按级别转成了郡县长官:《三国志》云,魏咸熙元年(264)“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⑥;《晋书》云,晋泰始二年(266)“十二月,罢农官为郡县”^⑦。西嶋定生结合《晋书·地理志》关于泰始二年设置若干新郡的记载指出,罢屯田官的指令下达于魏末,执行到位则在晋初^⑧。既然作为屯田官的典农都尉已转为县令或县长,那为何西晋的职官系统中还有典农都尉?

其二,就算西晋部分保留或重新设置了典农都尉,似也应该使其隶属大司农。曹魏诸卿中负责管理

① 相关论著太多,兹不一一列举,下文有所参引。

② 《晋书》卷24《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736-737页。

③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第729页。

④ 有学者主张将“车府典牧”四字点断,并与后文连读,理解为车府令和典牧令。参见刘啸:《从御用到国用:汉唐之际太仆制度的演变新探》,《江汉论坛》2012年第8期。笔者对此表示赞同。

⑤ 《后汉书》志26《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65年,第3591页。

⑥ 《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53页。

⑦ 《晋书》卷3《武帝纪》,第55页。

⑧ [日]西嶋定生著:《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等译,农业出版社,1984年,第241页。

屯田官的是大司农,这在《三国志》中有强证,亦是古今学界的主流看法^①。魏晋制度相承,何故西晋的典农都尉要隶属太仆呢?

针对《晋书》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西晋太仆所统典农都尉并非农官,“只不过是太仆之下管牧马、牧牛、牧羊的属官”^②。此种无视“典农”字面含义的判断显然不可取。刘啸则提出了如下三种假说,却因没有找到充分证据而未敢论断:

(1)衍文说,推测“典农”系衍文,因“農”“虞”两字形似而衍;

(2)权置说,推测西晋出于对吴战争的需要而临时设置典农都尉并将其划属太仆,目的是便于军粮和战马的统一调配;

(3)服务说,推测西晋典农都尉是为提供牲畜饲料而设^③。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假说中,第二种最难成立,盖汉末以降的数十年间大小战事无数,统治者一直未有把军粮交给太仆调度的举动,晋朝何必专为伐吴立此特制?又,东汉以来事归台阁,若欲统一调配粮马,大可令某位尚书从中协调,何必专委一卿?故此假说可以首先排除。至于另外两说孰是孰非,就要费些工夫来辨析了。

二、论“典农”非衍文

刘啸提出衍文说,主要是因为看到宋人孙逢吉的《职官分纪》征引自《晋书·职官志》太仆条目的文字中不含“典农”二字。但刘氏又发现成书年代更早的《唐六典》和《册府元龟》当中,所摘引的太仆史料与今本《晋书》行文相同,均含“典农”,这令他感到以典农为衍文的说法并无充分依据。刘氏对衍文说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孙逢吉的引文不含“典农”,很可能是因为孙氏对“典农”二字也抱有疑问,所以故意漏引。笔者认为,“典农”并非衍文,除刘啸所举的《唐六典》等文本证据作为支撑外,还可从另外两个角度予以论说。

第一,观察制度史可知,西晋太仆统领农官不算特殊现象。

从汉到晋,诸卿与其属官之间“业务不对口”的问题一直存在。以东汉的太仆为例,其属官中的考工令是一个“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和“主织绶诸杂工”的职位^④,与太仆的核心职掌可谓毫无关系。西晋时期,“统皇族宗人图谋”^⑤的宗正与其所领的太医令史之间也缺乏职能上的共通点。

更为关键的是,太仆下设农官在汉代就有先例。《史记·平准书》曰:“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⑥汉武帝推行算缗和告缗政策后,一方面将收上来的缗钱分拨给各官署支用,一方面又在大农、太仆等多个系统设置农官,分头经营罚没自民间的土地。

出土资料也证明西汉太仆系统设有农官。清代人发现了“捫马农丞”字样的封泥,周明泰指出该官

① 典农官具有行政长官的属性,不可能事事都归大司农领导。有学者认为,大司农与典农官的联系更多是业务性的,曹魏皇帝或实际最高掌权者对典农官的管理主要通过尚书台来实现。有关讨论可参见刘静夫:《曹魏屯田官隶属大司农说质疑》,《南充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杨荣新:《曹魏屯田管理方式探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马植杰:《论曹魏典农官的隶属关系和土家的地位》,《史学月刊》1993年第4期;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② [日]西嶋定生著:《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等译,第243页。

③ 刘啸:《从御用到国用:汉唐之际太仆制度的演变新探》,《江汉论坛》2012年第8期。“衍文说”“权置说”“服务说”非刘氏原文用语,只是笔者对刘氏观点的概括。

④ 《后汉书》志25《百官志二》,第3581页。

⑤ 《晋书》卷24《职官志》,第737页。

⑥ 《史记》卷30《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436页。

职即西汉太仆属官橐马令的五丞之一^①。陈直推测,橐马官署内外必有空地可供“试学赵过代田法”,“故设有农丞管理其事”^②。裘锡圭认为,秦代官廄一般有属于它们的官田,汉代的长乐廄亦然,“橐马官也养马,一定也有官田,所以设有农丞”,橐马农丞“跟《平准书》所说的太仆的农官也许不是一回事”^③。橐马农丞的存在,至少说明西汉的太仆系统在中央和地方上都置有农官。有前代先例在此,我们便无必要对西晋太仆统领典农都尉一事感到不可思议,进而怀疑文献本身。

第二,分析制度文献可知,隶属太仆的典农都尉其实曹魏末年就已存在。

唐人杜佑编撰的《通典》中载录了一份“魏官品”,祝总斌、阎步克认为“此魏官品的时间,不得早于咸熙元年”^④,反映了司马氏集团在篡代曹魏前夕所做的“制度创新”^⑤。“魏官品”形成于魏咸熙元年以后,对学界的这项主流认识,我们还可从屯田官的角度予以补证:“魏官品”中有与军屯相关的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⑥,却不见掌管民屯的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这分明就是咸熙元年“罢屯田官以均政役”的结果。

“魏官品”中无典农中郎将及校尉,却有一个七品官“典农都尉”^⑦。很明显,该典农都尉不属于已被撤销的屯田官序列^⑧。对照《晋书·职官志》,笔者认为此都尉就是西晋太仆所统的典农都尉。换句话说,太仆统领典农都尉的制度并非西晋才出现,而是曹魏末年就已设计好的。《通典》中包含的上述信息,是反对“衍文说”的一个有力证据。

三、“服务说”辨证

刘啸提出的三种假说中,“权置说”与“衍文说”都可排除,唯有“服务说”能够成立。《唐六典》记载,唐代太仆寺典廄署喂养牲畜的饲料中包含多种粮食:“凡象日给稻、菽各三斗,盐一升;马,粟一斗、盐六勺,乳者倍之;驼及牛之乳者、运者各以斗菽,田牛半之;驼盐三合,牛盐二合;羊,粟、菽各升有四合,盐六勺。”^⑨这则史料是启发刘氏提出“服务说”的关键。但是,凭唐代的官畜饲料信息去推导西晋典农都尉的职能,论证的缺环无疑过多,大有完善的必要。

畜牧饲料依赖农业生产,非独唐朝如此,历代皆然。基于简牍资料和前人研究,王世红、衣保中对秦汉时期马的饲料做了梳理,将马料分为饲粮和饲草:饲粮包括粟^⑩、麦、菽、黍等粮食作物的籽粒,饲草则以刍藁为主^⑪。藁亦作藁、藁、藁、稿,它是禾本科作物的茎秆,是粮食生产的剩余物。汉代的牛羊和马一样以粮、藁为主要饲料,东汉光和二年(179)弘农太守樊毅上书朝廷说道,该郡华阴县饲养祭祀用牲,每年要“用谷藁三千余斛”^⑫。魏晋时期牲畜的主要饲料与汉、唐没有什么不同,咸宁三年(277)杜预向晋武

① 周明泰:《再续封泥考略》卷1。见《中国古代封泥考略汇编》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5页。

②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页。

③ 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裘锡圭文集》第5卷《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5页。

④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55-156页。

⑤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第238页。

⑥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36《职官十八》,中华书局,1988年,第992页。

⑦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36《职官十八》,第993页。

⑧ 有学者将此典农都尉理解为从属于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的屯田官,从而对“魏官品”的创制时间产生了误判。见张旭华:《〈魏官品〉产生时间及相关问题试释——兼论官品制度创立于曹魏初年》,《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⑨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17《太仆寺》,中华书局,1992年,第484页。

⑩ 史料中的“粟”也经常泛指一切谷物。

⑪ 王世红、衣保中:《论简牍中所见秦汉时期马的饲料与饲养考察》,《中国农史》2016年第4期。

⑫ [宋]洪适撰:《隶释》卷2《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28页。

帝反映右典牧养牛过多,曰“徒有吏士谷草之费”^①,可见当时官牛也是要喂粮的。

自汉及唐,官府既向百姓征粮,又向百姓收藁。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都显示,秦汉时期的田税不仅包含作为正税的粮食,也包含作为附加税的刍藁^②。刍是牲畜可食的各种草类,由农民从休耕田及野地里收割^③。曹魏收藁于民,由栈潜对魏明帝的谏言可证,曰“都圻之内,尽为甸服,当供藁秸銍粟之调,而为苑囿择禽之府”^④。南朝文学家鲍照借古讽今、揭露农民负担沉重的诗作里有“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⑤之句,萧梁时期策试秀才的考题更直言百姓“时入刍藁,岁课田租”^⑥。《唐六典》明确道出唐代饲养皇家厩马的草料来自民间:“凡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供其刍藁。”^⑦又曰:“其诸州藁秸应输京、都者,阅而纳之,以供祥麟、凤苑之马。”^⑧

饲养官畜的粮食和刍藁主要征自民间,而官府利用官田为官畜补充饲料的史例亦不少见。汉代的官厩长乐厩附有“苜宿苑官田所”^⑨,种植马匹尤其喜食的苜蓿。唐代驿站有马者一般都“有牧田”^⑩,例“给地四顷,蒔以苜蓿”^⑪,以供驿马食用。唐人郗纯所撰《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云八马坊共“营田一千二百三十余顷”,管理者招募周边农户租垦,然后“税其生刍”与“藏厥嘉实”^⑫,其征草收粮之目的不言自明,就是“以给刍秣”^⑬。唐玄宗时,主管厩牧之事的王毛仲曾“蒔苜蓿、苜蓿千九百顷”^⑭来补充马匹的过冬饲料。唐代供应各地军镇粮储的屯田也种苜蓿^⑮,其主要用途当然也是喂马。北宋神宗时,枢密副使邵亢“请以坊监牧马余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利”,朝廷采纳其建议,从草地资源相对宽裕的七个牧监划出“良田万七千顷”,“赋民租佃,收草粟以备寒月之用”^⑯。既然饲用粮草可以取之于民,那么官府自主营农、从事饲料生产的动因何在?通观前举案例,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其一,官府营农,可以批量种植民间不常栽培的优质饲料作物。比如苜蓿,其初春时节的嫩苗适合“生啖”或“为羹”^⑰,但长成后便只宜饲马,不养马的广大农民只是把它当作葱、蒜、韭、蓼一样的调剂品,不会大面积播种。再如燕麦(苜蓿),它是一种高营养价值的饲料作物,“其籽实是马、牛的好精料,青刈燕麦的茎叶柔嫩多汁,可青饲、青贮或调制干草,各种家畜均喜食”^⑱,但它素非人的主食之选,不仅被排

①《晋书》卷26《食货志》,第788页。

② 张学锋:《论曹魏租调制中的田租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③ 结合简牍,学者们注意到秦汉授田制度下的土地形态有受田、垦田、輿田、税田之分。关于刍藁税的征收办法,学者们的意见尚存分歧,一说是以农民向官府报备的已垦田作为征税对象,一说是以农民的全部受田作为征税对象。相关讨论可参见晋文:《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研究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代国玺:《休耕制与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④《三国志》卷25《魏书·高堂隆传附栈潜传》,第718-719页。

⑤[南朝宋]鲍照著,丁福林、丛玲玲校注:《鲍照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321页。

⑥[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36《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61页。

⑦[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第225页。

⑧[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19《司农寺》,第525页。

⑨《后汉书》志25《百官志二》刘昭注引《汉官》,第3581页。

⑩《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343页。

⑪《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98页。

⑫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361,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4141页。

⑬《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37页。

⑭《新唐书》卷121《王毛仲传》,第4335页。

⑮[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第223页。

⑯[宋]杨仲良撰,李之亮校点:《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75《神宗皇帝·马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23页。

⑰[北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3《种苜蓿第二十九》,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162页。

⑱ 全国牧草品种审定委员会编:《中国牧草登记品种集(修订版)》,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除在五谷之外,甚至还因影响小麦收成而被农民视为害草。因此,官府要想获取足够的苜蓿和燕麦,只能自己组织生产。

其二,百姓按农田面积定额缴纳的粮草量未必总能满足官营畜牧业的需求,出现的供需缺口往往要靠官营农业来填补。民间上缴的谷稯不仅用于饲养官畜,更要优先供应皇室、官府、军队的饭食和燃料所需,因此不管是吏士增员还是官畜增殖,都可能造成饲粮饲草供应的紧张。比起吏士增员,官畜增殖给财政度支带来的压力更加明显,毕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①,牛马个体对粮草的消耗量远大于人。另外,自然灾害导致农业减产,土地隐匿和战乱割据导致税源减少,均会间接导致官营牧业部门粮草不足。面对短期的供应困难,牧业部门可以预先储料以备不虞,如唐代“关内、陇右、西使、北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藁及茭草”^②,所备藁、茭草各可支牲畜数年之食。而面对长期的供需紧张形势,官府若不愿听任畜群萎缩,便需为此自营农事了:唐代岐、邠等州八马坊募民营田的背景是唐太宗、高宗两朝官马“孳息成七十万六千匹”,至唐玄宗时犹有“四十四万匹”,数量为唐初“牝牡三千匹”的上百倍,马坊管理者为缓解物资压力,只能一面提前“停料野放”以减少饲料消耗,一面营田以增加饲料来源^③。

史籍没有明确记载魏晋时期的官马喂养是否使用特种饲料,但很多史料都能说明当时存在粮草紧张的问题。造成粮草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处在战争状态,缘边诸州的农业产出要用于供养边防部队,朝廷只能靠司、冀等腹心州的税收“内充府库”^④,而内充府库的物资也要供养中央官、军,其中能用作官畜粮草的份额可想而知是比较有限的。

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兴兵灭亡蜀汉,使国防压力有所减轻,但最主要的敌对势力孙吴尚在,因此统治者仍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史称“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厉精于稼穡”^⑤。为鼓励地方官发展生产,晋武帝于泰始四年(268)下诏,以中、左典牧都尉所养种、草马“赐县令长相及郡国丞各一匹”^⑥,一次就从中央直属牧场拨出近千匹马。晋初太仆所统厩牧的马匹总数不详,史料称“郭展为太仆,留心于养生,是以厩马充多,征吴得以济事”^⑦,既然服务于对吴战争,则马数和所耗粮草量必是相当可观的。同一时期,晋廷直属牧场的牛群规模也很庞大,典虞、右典牧二都尉所养种、产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余头”,咸宁三年(277)杜预建议“分种牛三万五千头”给兖、豫二州军民做耕牛,仅留“好种万头”由右典牧都尉养殖,朝廷从之^⑧。据分析,种牛是难以直接转化为耕牛的^⑨,那么晋廷分牛的首要目的应非助耕,而是节约中央的谷草开支,以及腾出牧地改作农作。

由于官马官牛多而税粮税草少,魏晋朝廷势必会有利用官田生产牲畜饲料的需要。曹魏时期,从事官田耕作的主力是典农中郎将、典农都尉等大小屯田官统领的屯田民,所谓“魏置典农,而中都足食”^⑩。在朝廷所需粮草主要依靠民屯补充的情况下,太仆系统大抵无需另设农官。魏末罢屯田官后,屯田民转为郡县百姓,屯垦的官田很多亦转交地方管理,朝廷的物资供应在短期内多少会受到些冲击,牧业部门所受影响则更大,因为朝廷无法直接干预郡县百姓的农作,无法要求他们定向定量地种植饲用作物。而在屯田制度下,屯田民的生产自由度低,统治者可命令他们栽培不符合农民自身利益的作物,比如曹操曾

①《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87页。

②[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第225页。

③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361《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第4139-4140页。

④《三国志》卷16《魏书·杜恕传》,第499页。

⑤《晋书》卷26《食货志》,第786页。

⑥《晋书》卷26《食货志》,第786页。

⑦[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25《职官七》引《晋诸公赞》,第706页。

⑧《晋书》卷26《食货志》,第788页。

⑨熊帝兵:《资治通鉴·晋纪二》杜预分民“种牛”献疑,《中国农史》2022年第4期。

⑩《南齐书》卷28《崔祖思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520页。

因需要稗子而“使典农种之”^①。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欲使厩牧的粮草供应尽可能少受影响,最优方案莫过于局部保留屯田制以专门服务畜牧业。笔者认为,这就是西晋太仆下设典农都尉的原因。

四、释“田驹”:西晋太仆系统的农作人群

西晋典农都尉督领下的农作属于何种性质,是民屯还是军屯?史书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同样留下了解答该问题的线索。《晋书·职官志》载,晋惠帝元康元年(291),晋廷按级别对中央官员配给菜田与人力:诸公“给菜田十顷,田驹十人”,特进“给菜田八顷,田驹八人”,光禄大夫、诸卿、三品将军、尚书令、太子二傅等“给菜田六顷,田驹六人”^②。这组史料中有两点信息值得注意。第一,其中反复提及的“田驹”群体,在西晋以前的历代史料中从未出现。第二,菜田属于公田,李文澜指出“它不属官吏私人占有,而只为职官提供俸禄”^③,那么田驹便是从属于朝廷的一种农耕人员了,可问题是“驹”与农事本不相干。

前辈学者对田驹的性质多有论断,如郑学檬云:“屯田兵民、田驹、文武吏、奴婢、僮仆等等,是国家的佃农或身份更低的依附农民。”^④朱大渭云:“西晋菜田由身份很低的田驹耕种,田驹实际上属于武士一类,同于军户,一人为一户,耕种一顷土地,田租可能同当时通行的分成制田租相似或稍高。”^⑤蒋福亚认为,田驹是屯田兵的一种^⑥。李文澜推测,田驹源于军屯废除后代替田兵耕种公田的官奴^⑦。这些论断各有各的凭据,却都未能从“驹”的字义出发考虑问题。《中国历史大辞典》中,黄惠贤撰写的“驹人”词条云:“(驹人)即田驹。养马人。……或释作随从骑卒。”^⑧尽管误将驹人和田驹混为一谈,但黄氏注意到了“驹”与马的关系,为我们探索田驹的身份提供了关键的突破口。

《中国历史大辞典》将驹人解释为养马人或随从骑卒,是符合史实的。《说文解字》云:“驹,厩御也。从马,𠂔声。”^⑨唐代人注《后汉书》云:“驹,养马人。”^⑩晋武帝派宦官乘车到各地选取良家女子以充后宫时,特“给驹骑”以壮威仪^⑪。驹人负责养马和驭马,说到底就是马夫。汉晋时期的官厩都有驹人,汉代未央、长乐二厩各有“卒驹二十人”^⑫;曹魏时,有名“当充甲卒”的“南征厩驹”因治好司空卢毓女儿的顽疾而被“奏除驹名”^⑬;西晋时,太仆嵇喜“知厩驹冯陵英俊,待以宾客之礼,以状表上”^⑭。驹人未必皆属太仆,但要说到所领驹人最多的中央官员,则自非掌管马政的太仆莫属。西晋太仆既领群驹,又统农官,将这两桩事实联系到一起,便不难推导出田驹的来源:他们是太仆系统的驹人,但不管养马驭马,而是被派去农作,故谓之“田驹”。

① [北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1《种谷第三》,第51页。贾思勰言,稗子的主要用途是酿酒和“饭牛、马、猪、羊”,据此笔者推测,曹操命屯田民种稗的目的可能就是补充马料。

② 《晋书》卷24《职官志》,第726、727、728、730、742页。

③ 李文澜:《两晋南朝禄田制度初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④ 郑学檬、蒋兆成、张文绮:《简明中国经济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3页。

⑤ 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的官俸》,《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⑥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⑦ 李文澜:《两晋南朝禄田制度初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⑧ 胡守为、杨廷福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474页。

⑨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版,第201页。

⑩ 《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李贤注,第2536页。

⑪ 《晋书》卷31《后妃上·武元杨皇后传》,第953页。

⑫ 《后汉书》志25《百官志二》刘昭注引《汉官》,第3581页。

⑬ 《三国志》卷29《魏书·方技·管辂传》裴松之注,第829页。

⑭ [清]张英、王士禛等纂:《渊鉴类函》卷254《人部十三·宾主二》引《晋书》,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版,第10册。

曹魏时期,补贴官员收入的方式之一是配给他们屯田民。《晋书》云:“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①所谓“租牛客户”,就是租用官牛的屯田户^②。而在西晋,配给官员的劳动力变成了田驹,这是田驹替代屯田民、成为朝廷公田耕作主力的结果。从晋朝配给各级官员的田驹数额来看,当时田驹至少数百人,联想到曹魏典农都尉各领屯田民数百夫^③,笔者判断,西晋典农都尉所管农作人群主要为田驹,或者全部由田驹构成。

严耀中指出,西晋时“公田由吏卒来耕耘好像已经形成制度”,其所举的证据之一就是西晋出现了田驹^④。驹人是一种吏卒,典农都尉率驹人营田,则其农作性质既不属于民屯,也不属于军屯。当然,身为吏卒的田驹可能是由一部分“租牛客户”转化而来的,也可能是由“土家”亦即军户成员充当^⑤。从曹魏时官廩驹人“当充甲卒”看来,西晋田驹出自军户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结 语

通过史料的梳理与比对,围绕《晋书·职官志》所载西晋典农都尉,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及推论。

第一,西晋太仆下设典农都尉是确实存在的制度,对照《通典》所录“魏官品”可知,该制度在曹魏末年就已设计或形成。

第二,太仆下设农官,是西汉就出现过的制度,并非魏晋特制;牧政部门营农的现象更为普遍,汉、晋、唐、宋皆有之。

第三,官营畜牧业依赖种植业提供饲料、补充饲草,是为牧政部门营农的深层原因;仅凭征收自民间的粮草有时无法满足官畜饲养的需要,是为牧政部门营农的现实背景。

第四,曹魏朝廷可依靠屯田民的生产来补足官营畜牧业所需饲料,其牧政部门应无营农的必要;魏晋易代之际废民屯为郡县后,统治者为保障官畜饲料的供应不受影响,乃局部保留屯田体制,在太仆之下设置了典农都尉。换言之,西晋典农都尉的主要职能是生产供应官畜的饲用粮草。

第五,西晋典农都尉督领下的农业生产,性质既非民屯也非军屯,其农作人群被称为“田驹”,是隶属于太仆系统的一种吏卒。

西晋典农都尉下设哪些吏员,又以何种形式组织农作,对这些情况,史籍俱无明确记载。已知曹魏典农都尉的属吏中有地位较高的“干佐”,也有地位卑下的“稻田守丛草吏”^⑥,西晋典农都尉的吏员想来也应有类似的高下区分。又,魏晋的军屯以五六十人为单位组织生产,曹魏淮南军屯“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⑦,晋咸宁元年(275)被调去“代田兵种稻”的邳城奚官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⑧,学者多依此推测曹魏民屯的组织形态,笔者认为,西晋典农都尉所领农作者很可能也

①《晋书》卷93《外戚·王恂传》,第2412页。

②张维华:《试论曹魏屯田与西晋占田上的某些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

③东汉末年梁习奉曹操之命伐木以供邳城宫室,上表“置屯田都尉二人”,共“领客六百夫”,由此可大致推知曹魏典农都尉的领民规模。见《三国志》卷15《魏书·梁习传》,第469页。

④严耀中:《北齐食幹制再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⑤关于曹魏土家的处境,可参考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土家制度》,《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30-36页。

⑥《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第775页。

⑦《晋书》卷26《食货志》,第785页。

⑧《晋书》卷26《食货志》,第787页。

被划分为同等规模的生产单元。

至于该典农都尉何时退出历史舞台,史书亦未明示。《通典》所录“晋官品”^①是对西晋中后期制度的反映^②,其中已不见典农都尉之名。笔者认为,太仆典农都尉的撤销应是在西晋平吴的太康元年(280)或之后不久。

平吴后,晋朝走出紧张的备战状态,皇帝下诏“诸州无事者罢其兵”^③。地方军队的大规模裁撤使直供中央的粮草增多,同时朝廷亦不用再维持往日的战马储备量,这些变化势必削弱太仆典农都尉存在的基础。

太康初年,晋武帝遣诸王、公侯各归封地,诏书要求:“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宅。今未暇作诸国邸,当使城中有往来处,近郊有刍藁之田。”有关部门依此制定实施方案:“今可限之,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④王侯进京朝觐,随行人员众多,供拉车和骑乘的牛马亦不少,往往要向沿途郡县责求“刍茭薪蒸”^⑤:刍茭是饲料,薪蒸是燃料,这两种物资的消耗都很大。由此可知,诏书所说的“刍藁之田”并非虚辞,供应刍藁确为其一项重要功能。笔者推测,这些赐给王侯的刍藁之田,原先的用途极有可能就是给官畜提供饲料。而晋廷将成百上千顷饲料田赐予王侯,就意味着以济牧为导向的官营农业,其生产规模已大幅缩减。若这一判断成立,则牧政部门实无必要继续专设都尉以典农事。至于元康元年晋廷调拨若干田驹去给中央官员耕种菜田,或许更能暗示太仆典农都尉已然撤销的事实。

又,《晋书·职官志》显示,西晋初年设置的屯田尚书,在太康年间被更名为田曹尚书^⑥。根据这一官名变化,西嶋定生推测“在晋初继续存在的军屯田,由于晋的完成统一而被废除”^⑦,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在全面废除屯田的大背景下,带有屯田官色彩的太仆典农都尉,想来亦无继续存在的理由。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太仆典农都尉存续时间的判定,其前提是《通典》中“魏官品”与“晋官品”的相关记录没有出错。然而,“魏官品”误收典农都尉,和“晋官品”漏载典农都尉,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学者指出,《通典》的“魏官品”并非原初的制度文本,而系唐朝人根据当时流传的魏晋官制文献整理而成,其中不免掺入一些西晋官名^⑧。既然如此,“魏官品”中的典农都尉也不排除是西晋所置之官,本当划入“晋官品”,却被唐人错误地移植进了“魏官品”。假如是这样,那么该典农都尉可能直到西晋后期都还存在。总之,我们需进一步加深对魏晋官制文献的甄别研究,如此方能就西晋典农都尉得出更加确定的认识。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37《职官十九》,第1003—1006页。

② 《通典》所录“晋官品”中,太子家令、率更令、仆等“太子三卿”位居第五品,这是太康八年(287)调整后的品级;四品官中有积射、强弩二将军,它们设置于太康十年。参见刘雅君:《汉晋间东宫三卿制的诞生与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4期;张金龙:《“魏官品”、“晋官品”献疑》,《文史哲》2017年第4期。

③ 《后汉书》志28《百官志五》刘昭注引晋武帝诏书,第3620页。

④ 《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0页。

⑤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1《后贤志·李宓》,巴蜀书社,1984年,第854页。

⑥ 《晋书》卷24《职官志》,第731页。

⑦ [日]西嶋定生著:《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等译,第271页。

⑧ 张金龙:《“魏官品”、“晋官品”献疑》,《文史哲》2017年第4期。